

乎税收和“创造货币”两者之间。这样，就其对总需求的作用来说，政府预算可以是“中性”的（所有支出都用税收抵充），也可以是“扩张性”的（税收少于支出）或“紧缩性”的（税收多于支出）。

公债的发行在使财政政策同货币政策脱钩这一点上能起重要的作用。例如，一个“扩张性”的预算（即有赤字）可以同一个“中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办法是用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一个“紧缩性”的预算（即有盈余），可以用来偿付公债，从而扩大货币和信贷的供应。

使财政政策能同货币政策脱钩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它们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向。例如，在联邦德国和日本，还有美国，都有这样的经验，即在长期内把“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为了限制消费、增加储蓄）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了鼓励投资）结合起来。但对中国来说，在改革取得进一步进展之前，这样的做法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在企业之间缺乏微观经济的严格的财务纪律会助长低效投资过度扩张。

工 资 控 制

所有国家的经验都有力地指出，需要对平均工资

的增长用某些永久性的方式加以直接控制。这是因为一些企业和部门工资的增长有极大的传染性，很快就会传到其他企业和部门，而工资一旦涨上去之后是很难再降下来的。不加控制地使工资随物价上涨而增长，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持久存在。

不幸的是，国际经验也有力地显示，控制工资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一方面要限制平均工资，另一方面又要对某些特定的个人和职业的相对工资进行适当的调整，如何把两者结合得好就更困难了。在联邦德国，由于在工资政策的目标上公众有高度一致的认识，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同法国、英国等国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国家里，深刻的内部分歧使得政府实行志愿的或强制的工资控制的尝试控制失败，造成“名义工资”不断迅速增长，尽管失业率很高。

与会外国学者一致建议，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应对工资保持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控制应不限于基本工资，而要扩大到奖金和对工人的其他报酬。后者的增长往往被用来逃避对基本工资的控制，这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都一样。对工资或奖金的超额增长部分征收累进税，正如现在在中国和若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那样，在英、美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人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SMM)

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邀请中外经济学家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外国著名专家、学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托宾、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前会长阿莱克·凯恩克罗斯、法国国家计委前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联邦德国中央银行前行行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研究部主任亚诺什·科尔奈、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弗·布鲁斯、南斯拉夫法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巴伊特、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尔·琼斯、世界银行代表林重庚、艾德林·伍德，以及列席代表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主任小林实。参加讨论会的中国代表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陈如龙、童大林、尚明、高尚全等。中外学者就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介绍了国际经验，并对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见解。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讲，中外学者、专家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体制模式的转换、体制改革的环境及所有制关系的调整 and 改革等几个方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科尔奈从经济协调机制角度对经济模式进行了分类，并根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机制。关于经

济体制模式转换，中外学者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模式、“一揽子”和“渐进式”转轨的分离或配套、双重体制和两难选择等问题。关于经济改革的环境，中外学者提出了要想保证经济改革的平稳起步和顺利推进，必须刹住经济的超速增长，尽可能控制住通货膨胀。关于所有制关系变革，专家们指出，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必须名符其实，非国有经济应当扩大，但国家所有制的非国有化并不可取。

就宏观经济管理来说，中外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宏观经济管理的两种方式即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宏观经济需求面的管理：对付需求牵动型通货膨胀的得力措施——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供给面的管理：战胜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有效武器——收入政策；对外贸易管理和国际收支平衡及宏观调节的微观基础和前提等问题。学者们还就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积极果断地改革价格和建立健全经济信息与经济监督系统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历时六天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是一次难得的盛会。上述几方面的讨论成果有不少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有许多新问题要解决。我们应该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认真探索，锐意创新，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出努力。